哲学·政治·法学研究

阿尔都塞与福柯的思想师承

成文秀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路易·阿尔都塞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福柯是20世纪法国极富传奇色彩与反叛性的思想家,生活于同一世纪的二人相识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而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的理论道路虽然大相径庭,但二人思想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联系,阿尔都塞和福柯思想之间有着较多的相通之处。论文试图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分析与福柯的权力分析等方面阐述阿尔都塞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联系。阿尔都塞作为福柯的老师,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思想上都对福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是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主体、难题性(总问题)的研究,还是福柯对于权力、主体、知识型的研究,都可以看到二人之间的确存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联系。

关键词:意识形态;权力;阿尔都塞;福柯;主体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7)06-0130-04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6.029

On Thought Inheritance between Althusser and Foucault

CHENG Wen-xiu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Louis Althusser is a well-known Marxist philosopher of France in the 20th century. Foucault is a legendary and rebellious thinker in Franc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y lived in the same century and met the Paris Normal School and developed the deep friendship. Although the theoretical road of the two is different, there are still importan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thinkers, and Althusser and Foucault have more similari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husser and Foucault from the aspects of Althusser's ideological analysis and Foucault's power analysis.

Key words: ideology; power; Althusser; Foucault; subject

路易·阿尔都塞——法国最具原初思想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亦是“二战”后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旗手——与同样饱受争议、毁誉不一的哲学家福柯二人具有师承关系。阿尔都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福柯明显拒马克思主义并与其保持适当地距离,二人看似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理论道路,实则研究上具有很多相似且相通之处,二人之间既有着差异性,也存在着继承性。厘清阿尔都塞与福柯的联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福柯的思想,也能促使我们去深入挖掘福柯与其拒斥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

一、“意识形态”与“权力”之联系

(一)“意识形态”与“权力”的无所不在性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阿尔都塞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将国家机器分为两类:国家机器(AE)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指的是人们惯常想到的政府、国家、官方机构所宣扬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的无所不在性,你越感到“自由”的地方实则都已经是被意识形态所包裹着的地方。例如学校,阿尔都塞认为,

收稿日期:2016-11-12;修回日期:2017-04-01

作者简介:成文秀,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校向儿童们灌输着某些“知识”，这种“知识”实则“是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包裹着的‘本领’（法文、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教育和哲学）”^{[1]290}，意识形态就像空气一样包围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没有空气人类无法生存一样，“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2]228}。与阿尔都塞的“空气”般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相同，福柯的“权力”也具有无所不在性，权力是内在地存在于所有社会关系之中的，他强调微观权力关系的广泛性、多样性。福柯谈论的权力，是一种权力关系。它与政治、统治社会的统治阶级这些无关，它更多地指的是无论在家庭、学校、人际交往之中，权力关系的始终存在。“当我说到政权机器时，指的是它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存在形式，它与每个人切身相接的那一点：它进入人们的肌理，嵌入他们的举动、态度、话语，溶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每日的生活”^{[3]269}。对于福柯而言，权力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或者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的经验问题，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发挥着作用。

（二）“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与“权力”的微观运动

阿尔都塞在论述意识形态时，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即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只能依靠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物来发挥作用，“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1]299}。无论是体育、娱乐还是家庭、学校，实际上都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具体而言，就是指意识形态需要借助学校、工厂、文化机构、医院等来发挥其作用，我们生活在这些物质性机构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改造。与阿尔都塞这一观点相类似的是，福柯对于“权力”的微观运动有着密切而持久的关注。福柯的权力观主要关注在医院、监狱、家庭、学校之类。可以通过对于家庭、学校的分析来阐释这一点。大体上而言，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体制规范在表面上看是为了分配知识的，而实际上是为了某个掌握权力者排挤其他未掌握权力者而服务的，知识本身就是与权力共存共生的。比如说，一部学校使用的教材的编订，所选的内容实则就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教材的受众者是全体青年学生，被选择的内容（文章、作品、作家）则有可能不断更新、被人不断研究、

继续增殖，而未被选择的内容、作家则势必经过时间的冲刷而被大多数人所淡忘。现代权力潜移默化地将人塑造造成服从规则、标准的“标准人”，借助着知识和真理的掩护，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被规训。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其实都是意识形态、权力运作的场所，只是这种运作是那么隐蔽而分散，以致于它们的“显而易见”在我们眼前变得那么“自然而然”。

二、“主体”何在

自古希腊哲学迨始，普罗泰戈拉喊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再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等，可以说哲学已经探出些许对于主体、自我意识等看法的模糊微光；到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的重新发现，高扬人性的复归，可以视作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复苏；直到笛卡尔高喊出“我思故我在”肇始，确立了人在自然界的中心位置、理性的中心地位，确立了主体性；再到康德哲学，“人为自然界立法”论断的提出，“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我们必须不是通过经验，在自然界里去寻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而是反过来，根据自然界的普遍的合乎法则性，在存在于我们的感性和理智里的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中去寻求自然界”^{[4]92}。从而，自我主体成为了知识何以可能的前提，主体问题也成为了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之后的哲学家那里，主体始终是作为知识产生的基础而存在的，即“主体”创造了“知识”，而主体的存在更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无论是对于阿尔都塞还是福柯而言，“主体”都不是自然的存在，不是历史的存在，或者说主体是不存在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空洞、一片虚无，是由非自然的手段建构起来的。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自然而然、显而易见的东西，这背后总是意识形态在作祟。比如认为你我都是主体，这似乎是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人去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但阿尔都塞说：“你我作为主体这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以及它的无可置疑——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果，是基本的意识形态的后果。把显而易见的事情当作显而易见的事情强加于人（而又不动声色，因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恰恰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性”^{[1]362}。而个人正是被意识形态建构成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1]303}，意识形态的存在目的就是这些具体的主体，而意识形态的目

的——即借助于主体的范畴和它所发挥的功能——也只有通过主体才能实现。因此,主体的位置是已经存在的(被意识形态所预设好的),比如说,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他/她的父母亲已经为他/她想好了名字,他/她的家庭背景也已经存在,即使他/她还未曾出生,他/她(的主体性)也已经是被家庭关系中的这一意识形态所确立。因而,在阿尔都塞看来,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是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赋予的“主体性”,是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不断地塑造着个体,使之成为一个主体,这样的主体是由意识形态填充所形成的,并不是人所本身存在的那个主体,人并不是其所是。这与福柯的“主体”观点也是相似的。福柯说:“在18世纪以前,人并不存在。生命力、劳动多产或语言的历史深度也不存在。它是完全新近的创造物,知识造物主用自己的双手把它制造出来还不足200年;但是,它老得这么快,以至于我们轻易地想象他在黑暗中等了数千年,等待他最终被人所感悟的那个瞬间”^{[5]402}。他认为,主体的概念是近代知识的产物,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并不是作为一个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历史产物而存在着的。福柯始终拒斥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的主体理论,他否认存在具有普遍性的、一致性的主体,而认为主体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得以构成的。对于福柯而言,必须研究的是“一个人演变成主体的方式”^{[6]298},即主体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福柯在《词与物》中大胆地疾呼,“人死了”,而这并不像某些歪曲福柯的观点的人所言,即福柯是反人类的。实则在这里福柯所强调的是“人”作为“主体”概念来说,是不存在的了。“人”(的主体性)是在由法律、话语、建筑安排、监管决策、行政手段、科学陈述和哲学、道德及慈善等等“一整套装置”中建构出来的。是“装置”预设了一个空洞的主体位置,无论是谁占据这一位置,他/她所做的事情实则仅是按照该位置预设的规范来实现所允许的事情罢了。福柯将主体视作是权力机制的产物,而不是一个自然产物。总而言之,福柯和阿尔都塞都承认主体在社会层面的多样性,以及主体无法完全占领自己的位置,只能由像“意识形态”、“权力”、“知识”这样的东西来作用它,将其主体性位置占据。也即“主体远没有掌握对自己的绝对控制权,他的存在无不打上社会生活的烙印”^{[7]37}。”二人都在批判主体性,否认具有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主体,试图去消解主体,颠覆主体,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

三、阿尔都塞的“难题性”(problematic)与福柯的“知识型”

福柯认为,人们是不可能任意一个时代言及任意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思维不可能越过“话语”的边界,我们也无法看到那些边界。无论福柯是去研究性的历史、监狱的历史、疯癫的历史、人文学科的历史还是其他什么问题,他实则并不是拘泥于某个特定的概念,他关注的是“真理”的历史,或者说“问题”的历史,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何在这个时刻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何以可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难题性(problematic)”(或译问题式/总问题),这个“难题性”规定了该时代提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提问的结构等等。福柯在《词与物》中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型”的概念。所谓“知识型”可以视作是西方一个时期的思想范式,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知识型”,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古典时代知识型以及现代知识型等等,知识型决定了一个时代的话语结构,即什么能够被我们说出与什么不能够被我们说出。“在任何社会中,知识、哲学观念、平凡的日常信仰,以及设置、经济和政治实践、社会习惯——所有这些引导我们回到某种该社会的固有知识型。这一知识型与科学书籍、哲学理论和宗教中所发现的知识具有很大不同,然而,它们却在给定的时刻使理论、信仰、实践的出现成为可能”^{[8]36}。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时代思考的问题、使用的概念和话语结构都是内在于这个“知识型”之中的,问题是透过这一框架才提出的,它受到这一框架的约束与限制。我们不能完全跳脱出这个“知识型”去讲话,它规定了我们能讲出的东西以及无法讲出的东西。这个观点似乎不难让我们联系到马克思的提法:“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9]413}。而福柯的这个“知识型”与阿尔都塞的“难题性”(problematic)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清晰地阐述了他对于“总问题”(即“难题性”)的看法。他提到“哲学家一般并不思考总问题本身,而是在总问题范围内进行思考”,“而这个总问题却在思想的内部确定着各具体问题的意义和形式,确定着这些问题的答案”^{[2]56}。人们(或者说哲学家)只能从“难题性”出发,“难题性”限制着人们提出问题的方式、结构,但是人们意识不到“难题性”的存在。日本学者今村仁司解读“难题性”时这样说道:“任何思想都有在其内部不被自觉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在思想深处(即不知不觉间)

决定思想家的思考方向,而且甚至彻底地规定了其用语乃至概念意义的方向。这样的思维方式就叫做‘总问题’”^{[10]123}。可见,无论是阿尔都塞的“难题性”(总问题)还是福柯的“知识型”都是某时代某一问题得以提出预先存在的隐形的内在结构,人们感受不到它,却处处以它为先,受它束缚。无论是福柯还是阿尔都塞都承认,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难题性”(或者说“知识型”),人们必须在它里面进行思考,二人的研究关注点也同样的都是在这个“难题性”上。

四、小结

虽然阿尔都塞与福柯有很大的相似性,或者说福柯对于阿尔都塞有一定程度上的继承性,但是二者之间仍存在本质的差异。阿尔都塞虽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但是阿尔都塞的理论根基仍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是建立在马克思表述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之上的,他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归根到底是具有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各种意识形态就不是从AIE当中‘出生’的,而是来自在阶级斗争中搏斗着的各社会阶级:来自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斗争经验,等等”^{[13]15}。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有其“基底”存在而得以存在的,不存在没有基础的意识形态。用马克思的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按照一个地形学的模式来描述的,用一座大厦来比喻,经济基础就是地基,上层建筑就是树立其上的楼房。而福柯的权力观点则与之不同,可以说,福柯的权力观点是按照一个拓扑学的模式来描述的。福柯并不否认权力会受到经济关系的影响,但福柯否认所有的权力关系都是根据“基础”来运转的,可以存在“无基础”的权力,不依赖物质性基础也可运行的权力。权力并不是总在某一方,权力关系像是网状,有行为的地方就有权力。福柯曾宣称“权力没有别的基础,而只有权力关系本身,因此权力在行使自己的范式中衰竭”的观点^{[7]89}。福柯并不把权力看作是有一个神秘的本质,“而是把权力看作一种并不具有必然的本质形式的关系,强调权力在于其实施,因而对权力作了非本质主义的分析”^{[11]227}。关于有无“基础”的区别可以视作阿尔都塞与福柯本质上的不同,这也是二人最大的差异性。福柯刻意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

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权力观”,提出并发展了自己关于“权力”的独特研究。

毫无疑问,阿尔都塞作为福柯的老师,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思想上都对福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论是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主体、难题性(总问题)的研究,还是福柯对于权力、主体、知识型的研究,都可以看到二人之间的确存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联系。但是,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也不容忽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他的理论基础也始终是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上的。而福柯抛弃了那种企图成为唯一的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他有时也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概念,但是他还是有意地远离马克思主义,孤独而坚毅地去寻找着那些沉默的历史。深入梳理、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对充分理解二人的思想都有较大的帮助。并且,对于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上的我们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域下去关照其他理论,更易于我们发现其他理论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去改造它、运用它,不断丰富我们的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 [1] 路易·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下)——阿尔都塞读本[M]. 陈越,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 [2] 路易·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3] 杜小真. 福柯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 [4]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5] 福柯. 词与物[M]. 莫伟民,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6]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7] 莱姆克. 马克思与福柯[M]. 陈元,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8] 王治河. 福柯[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9]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0] 今村仁司. 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11] 莫伟民. 莫伟民讲福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